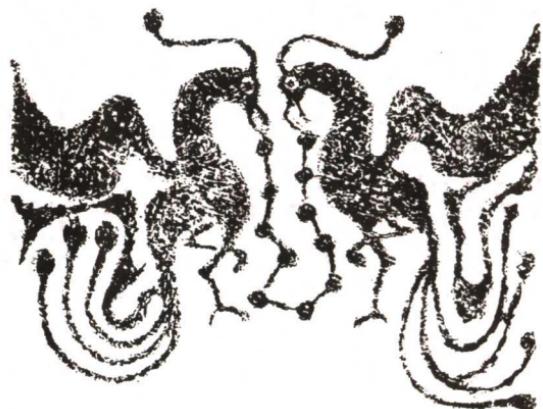


HANLINGDIYUHANMOSHEHUI

汉灵帝与汉末社会

◎ 徐难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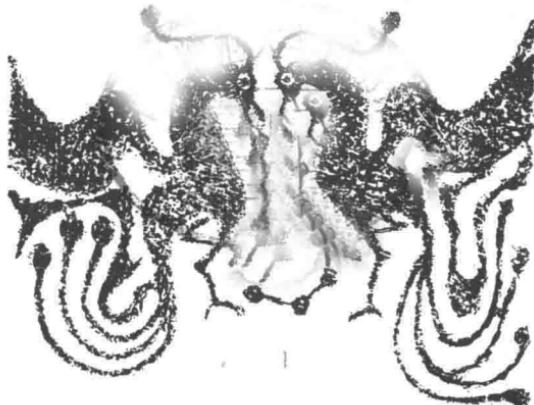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HANLINGDIYUHANMOSHEHUI

汉灵帝与汉末社会

◎ 徐难于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灵帝与汉末社会/徐难于著. —济南：齐鲁书社，
2002.5

ISBN 7-5333-1040-3

I . 汉… II . 徐… III . 中国—古代史—研究—东
汉时代 IV . K234.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3563 号

汉灵帝与汉末社会

徐难于 著

*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邮编：250001

日照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040-3
K·303 定价：14.60 元

前　　言

几年前，我曾应出版社之约而撰写《汉灵帝传》。那段写作经历，使我对汉灵帝与汉末社会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基于这样的原因，我萌动了撰写《汉灵帝与汉末社会》的兴趣。从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角度讲，这一选题应当是很有意义的。学术界对汉灵帝的研究，迄今仍属空白点，而汉末这一历史时期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亦比较薄弱，诸如戚宦擅权、党锢之祸、黄巾起义、民族关系、军阀混战局面的形成等等，皆有待作更加深入的探讨。本选题的主旨即以灵帝为中心，以灵帝时期的社会生活为主线，深刻而全面地反映灵帝所属的那个时代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特点和发展结果。本书在写作中坚持学术性与可读性统一的原则，因此，自信其既可为治汉史的学者提供参考，推动汉史研究进一步深化；又可为广大历史文化爱好者深入了解汉末社会，提供一种帮助。

灵帝是一个衰世皇帝，东汉王朝是在他当朝之际走向“名存实亡”的。所以，封建正统文人、史家历来对他都不感兴趣，评价也甚低。迄今为止，对灵帝的定论不过是“衰世昏君”而已，甚至有指其为“白痴”者。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我悉心研读了能看到的关于灵帝的所有材料，对灵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这些看法或不甚

成熟,或有所不当,但是它们毕竟可以对认识和理解灵帝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灵帝与宦官的关系,从来都是人们论定其“昏庸”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视其为“白痴”般的政治低能儿的惟一依据。人们一般认为,灵帝朝的朝政完全由宦官控制、操纵,灵帝自己则被权宦玩弄于股掌间。灵帝当朝的二十多年中,宦官的权势的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这绝不是由于灵帝的昏庸,而是由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灵帝为巩固和维护皇权的需要所造成的。东汉一代,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削弱,豪族大姓势力不断膨胀的大势下,和帝以后,作为豪族大姓政治代表的外戚便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外戚势力总是朝着专权擅政的方向发展的,皇帝则通过重用宦官来抵御外戚擅权。桓帝朝,梁氏外戚将外戚的专权擅政推至极盛,这就带给灵帝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灵帝即位之初,权欲熏心的窦氏外戚和官僚集团结成统一战线,致使比梁氏专权更为可怕的外戚专权端倪已现,再加上灵帝自己对皇位、皇权的极端敏感与虚弱心理,遂逐渐形成倚重宦官巩固皇权的指导思想。灵帝在位的二十多年里,倚重宦官的指导思想虽然一直根深蒂固,但由于权宦往往将皇帝赋予之权用过了头,所以灵帝对宦官不得不实行既倚重又限制的统治术。光和年间(178—183年),灵帝重用铁腕大臣阳球,诛杀了宦官重要头目王甫及其同党;中平年间(184—189年),灵帝在宦官集团内部重新扶植心腹权宦,并重用制衡权宦的公卿。这些事实,明白无误地说明,灵帝对权宦并非仅仅是依赖和重用。灵帝一朝,宦官权势虽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毕竟尚未能凌驾于皇权之上,控制朝政。

灵帝出生的时候,既是东汉王朝的季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

初期这一历史阶段的末期，受累于封建社会初期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的种种积弊，东汉王朝的统治已濒临覆亡边缘。在政治极度黑暗、国库如洗、百姓困竭、各种反抗连绵不断的背景下，12岁的刘宏履至九重之尊。汉灵帝刘宏当朝以来，曾穷奢极欲地大兴土木，肆无忌惮地卖官鬻爵，封建帝王固有的荒淫本性在他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但为了维护危如累卵的统治，他一直努力使官僚、外戚、宦官三股重要政治势力互相制衡以巩固皇权。他创立“侍中寺”，设置“三互法”，以澄清吏治。他反传统，创办“鸿都门学”以塞“朋党请托”之路。然而，他的一切努力皆因少有成效而变为徒劳。写完《汉灵帝与汉末社会》，一个问题总是萦绕在脑际：倘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生于斯世，当政斯世，他们是否能有“回天之力”？

灵帝朝的卖官鬻爵，已卖到朝廷的最高官职三公，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如果只归结于灵帝的昏庸、荒淫，未免失之肤浅。就灵帝的荒淫而言，其并非中国历史上登峰造极的，为什么唯独灵帝朝出现了绝无仅有的沽售官爵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既与灵帝的贪婪及嗜欲有直接关系，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尽管反映灵帝朝宫闱情况的材料不多，但有限的材料仍较为曲折地反映出，当时宫闱之中权势之争的波谲云诡与惊心动魄。灵帝、官僚集团、外戚、宦官都希冀以“废立皇后”和“立太子”作为扩大与巩固权势的手段，所以灵帝朝的“废立皇后”和“立太子”既显得扑朔迷离，又充满了浓郁的血腥味。灵帝虽然不乏荒淫之行，但是在佳丽粉黛成百上千的后宫，竟对一个女子萌生出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爱。然而，端坐在权力金字塔之顶，对芸芸众生握有生杀大权的灵帝，却无力保护他倾心爱着的

那个女人，这无疑给灵帝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更增添了几分悲凉。

由于史料的欠缺，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易于停留在表面。为了尽可能避免这一不足，在信史的基础上，作者对一些问题作了合乎逻辑与情理的推测、判断。

本书以灵帝为中心，对汉末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现象进行了综合考察、分析。在考察、分析中，将所涉材料系统地组织起来，并以系统的眼光观察、研究所涉对象，将其置于有机联系中去把握，从而使我们的认识能从不同角度获得呼应与支持。

对灵帝及书中所涉重要人物的分析，既注重社会环境对历史人物的影响，亦注重挖掘人物本身的心理活动，由此增强了认识上的可信度与深刻性。

如上所述，对本书的价值与意义，我始终心存自信，然而这份“自信”能否成立，只能由读者去评说。

徐难于

2001年夏

目 录

前言 1

一、衰世当皇帝

1. 东汉王朝江河日下	1
政治黑暗 百疴辄生	1
天灾人祸交织 国库如洗	21
战争呐喊 起于四野	24
哀鸿遍地 野有饿殍	30
2. 灵帝登基	33
韬光养晦 窦氏再度辉煌	34
河间外藩 入继大统	41

二、“党锢之祸”

1. 党祸初炽	45
“清流”激荡	46
党祸骤起	54
2. 统治序幕在血泊中拉开	57

桓、灵之际的政治新格局	57
宫廷风云突变	61
3. 血腥镇压党人	68
党祸再起	69
太后葬礼之争	76
诛杀勃海王悝	84

三、穷途末路中的改革

1. 整饬吏治 修补制度	89
除弊求治 步履维艰	89
省尚书 设中寺	101
防范朋党 立“三互法”	106
2. 反传统 置“鸿都门学”	108
官吏选任制度运转失灵	108
力排众议 置“鸿都门学”	111
3. 经济改革中的搜刮风	121
饮鸩止渴 卖官鬻爵	121
修宫室 税天下田	131

四、边陲风云

1. 西北羌胡卷怒潮	139
诸羌屡叛 朝廷剿抚两难	139
羌胡连结 汉王朝险象环生	146
羌胡叛乱稍定 汉祚亦衰	160

2. 鲜卑、乌桓之患	161
鲜卑连年寇边 朝廷苦无良策	162
劳师袭远 汉军塞外溃败	163
衅端四起 汉吏勾结乌桓叛乱	167
3. 动荡的西南边疆	172
“西南夷”的反叛	173
“五斗米道”的起义	177

五、掖庭争斗 波谲云诡

1. 宋皇后的立与废	180
选立宋后	180
屠户之女入掖庭	185
权宦翻云覆雨 宋皇后命归黄泉	186
2. 灵帝的悲哀	192
王美人之死	192
灵帝的悲哀	196

六、黄巾大乱天下 王朝风雨飘摇

1. 大风暴的酝酿	200
《太平清领书》的出现	200
传播太平道 蓄积起义力量	203
2. 黄巾大起义	212
天下震荡 “烟炎绛天”	212
朝廷磨刀霍霍	215

屠灭黄巾军	217
起义星火再燎原	221
宦官与官僚集团的再次较量	226
 七、群雄龙争 东汉衰亡	
1. 戚、宦决战	236
外戚与宦官的角力	236
灵帝驾崩 祸乱遽起	243
宫廷喋血 戚、宦同归于尽	246
2. 董卓之乱	259
抗拒昭命 以观时变	260
进兵京师 擅政专权	265
3. 群雄蜂起 天下分崩	269
改刺史为州牧	269
东方的联盟	273
军阀混战 逐鹿中原	275
附：汉灵帝大事年表	278

一、衰世当皇帝

建宁元年(168年)正月己亥日,一连串白盖小车,在羽林军的护卫下,顶着凛冽的北风,快马加鞭地由河间驰往洛阳。到了洛阳,小车队停在夏门外的外寿亭。那里早已守候着引颈东望的文武百官。从一辆白盖小车中,走出一位13岁的孩子,换乘了早已停放在夏门外的豪华青盖车。青盖车在文武百官和羽林军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驰入皇宫,并一直驰向皇帝的御座。

1. 东汉王朝江河日下

随着和帝在元兴元年(105年)的逝世,东汉王朝统治的兴盛时代也一去不复返。此后的东汉政权,因受累于封建社会初期专制集权政治的种种积弊,正像一个早衰的病人,蹒跚地走向那通向死亡的漫漫长路。

政治黑暗 百疴辄生

前211年,秦统一中国,中国的历史便选择了以皇权为轴心的专制主义集权制度。于是人们便崇拜皇权、神化皇权。但是,仅仅从秦王朝到东汉末的短短几百年间,围绕皇权,不知招致了几多灾难,爆发了几多厮杀。

延熹二年(159年)八月的一天,怒不可遏的桓帝终于下决心铲除专权骄横的外戚梁冀。但冷静下来后,桓帝又对自己的“诛梁决心”弄得很紧张,便趁入厕之机,召小黄门唐衡商议诛梁大计,继而密诏单超、具瑗、左悺、徐璜、唐衡五位中常侍入宫共商大计,在空气似乎都凝固了的紧张气氛中,桓帝与五常侍扼要地交换了意见,定下密议,桓帝还亲啮单超臂,以血为盟。一场残酷的宫廷权力争斗马上就要在刀光剑影中展开。

自和帝以后,东汉王朝的统治便逐渐进入一个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士族大地主的权势急剧发展,与专制皇权产生了尖锐冲突;外戚、宦官作为不同的势力集团,在染指宫廷政治斗争中权力不断膨胀,进而侵蚀皇权。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君道昏乱局面的出现。这一切,乃是封建专制制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在专制制度下,一方面,作为统一地主阶级不同集团、派别的意志,调节相互利益冲突,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对广大农民的有效统治,皇帝被地主阶级推至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集团、派别受自身利益的驱使,又不可避免地要与皇权存在矛盾,形成对皇权不同程度的离心力。从一般意义上讲,专制皇权强化的程度越高,君臣之间权力距离越大,群臣百官对皇权的离心力也就越强。因此,从秦王朝到两汉,随皇权的不断强化,皇帝往往不得不赋予外戚、宦官政治权力,作为抵制、克服离心力和巩固皇权的补充手段。

西汉时期,外戚政治随君主集权专制统治不断强化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但是外戚势力的急剧膨胀,最后又走向了专制皇权的反面,导致了权移王氏,改姓易命的结局。外戚政治的这一历程给东汉初期的统治者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和沉痛的教

训。所以，东汉王朝建立之后，在全面强化专制皇权的过程中，光武、明帝即以“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①为指导思想，在政治上对外戚严加控制与防范^②。然而到章帝时，东汉初年“外戚之禁”被一种外戚政治新格局取代的端倪却开始出现。

章帝亲任外戚窦氏参与朝政。皇后兄窦宪仗恃宫廷声势，结交士大夫中的无耻之徒，为所欲为，甚至侵凌诸王子、公主、贵戚^③，其势已炙手可热。元和三年（86年），太尉郑弘上书弹劾窦宪奸恶“贯达天地”，并以外戚王莽篡位的前车之鉴告诫章帝^④，章帝却无动于衷。章帝对外戚的放纵，为窦宪在和帝时期秉国执政、开东汉一代外戚专权之风，打下了基础。

史载章帝性宽厚，好儒术，人称为长者，所以对章帝弃置“外戚之禁”的原因，论者往往宁愿从个人的角度去解释。王夫之指出，“元帝之失以柔，而章帝滋甚”^⑤。他进一步指出，章帝的宽厚是造成东汉王朝权柄下移、君道昏暗的重要原因。章帝实行宽厚政治，以至于不顾光武、明帝所倡的“外戚之禁”，其生性宽厚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支配章帝宽厚政治和东汉长达近百年的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则是专制皇权高度强化与士族大地主势力急剧发展的矛盾。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自西汉中期以后，士族大地主的势力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东汉王朝赖以建立的社会阶级基础的重要部分，就是豪家士族地主。在统治集团内部，皇权与豪强士族势力的关系始终处于既互相依赖又相互矛盾之中。一方

① 《后汉书》卷十《明德马皇后纪》。

② 《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伦传》。

③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

④ 《后汉纪》卷十二“元和三年”。

⑤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

面豪强士族是王朝统治阶级基础的重要部分,而且其中的皇亲国戚更与皇帝有直接联系;另一方面,皇权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豪强士族势力过度膨胀,就会使统治阶级内权势、利益分配失去平衡。如此,不仅会对皇权形成一种离心力,而且还会激化阶级矛盾,最终危及王朝统治。两者关系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皇权既要对豪族士族势力进行抑制、打击,同时又必然会对他们予以一定程度的保护、扶植。豪强士族大地主是东汉王朝重要社会阶级基础这一现实,决定了东汉王朝总体上对士族、豪强是以优容、庇护为主,即使打击、抑制也具有很大的妥协性。开国之初,东汉王朝对以功臣、外戚、宗室为首的士族,主要从军政实权上予以限制和裁抑,在生活上、门第上、名位上则尽量优容。在东汉政权的庇护和优容下,各地豪强士族地主经济实力急剧发展起来。

由于以贵族、功臣为首的世家大族经济实力日益膨胀,所以也就不愿在政治上再屈从皇权了。集士族大姓、皇亲国戚于一身的外戚,力图重温西汉外戚尊荣显贵的旧梦,所以常常“出怨望语”^①,流露出对现实处境的不满情绪。外戚的不满情绪很快影响到中央王朝及地方郡县一批有相同心态的出身士族大姓的官吏,于是他们纷纷对刘秀、刘庄父子的“严政”提出批评,要求改行宽厚政治,其实质是要皇帝放权。不断的批评、抨击,让章帝感到了巨大的压力^②。在这种背景下,尚书陈宠认为“宜改前世苛俗”,上书章帝,建议“济之以宽”^③,而章帝则欣然接受,遂逐渐改政风之苛严为宽厚。势力强大的豪门士族与刘氏分享政权的前奏曲在章帝时奏响了。

章帝以后,随豪门士族势力的膨胀,皇权在士家大族面前正

①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

②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③ 《后汉书》卷四十六《陈宠传》。

逐渐丧失着控制优势。为了使固有的专制集权机制在这样的现实中正常运转，新的权力运作与分配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要求分享刘氏政权的豪门士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从各地入仕中央，并根据自己的利益而结成一个个地区性的朋党集团，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同时，在望族大姓之下，还有地方的低层豪强地主，这些人专营土地、工商之利，担任县吏、乡官之职，统治县与乡里，是东汉统治的社会基础。从总体上看，对于专制君主来说，必然要选择与之关系密切，既能代表皇权利益，又能协调各方关系的人来维护统治秩序；而在士族大姓一方，则希望自己所属集团获得中央皇权的支持，在中央扩大势力，为此他们势必推举出能协调皇权和其他派别集团关系的代表。依凭椒房之宠而至尊位的外戚正好成为双方谋求的对象^①。

章帝末朝，出身于三辅的士族势力渐渐在中央政权中占据优势，并与南阳、颍川出身的士族官僚形成对立。为了保持和扩大在中央政权中的优势，三辅士族官僚共同推举出生同一地域的士族兼元功之臣的窦氏外戚为其利益总代表，三辅集团势力由此扩大。其后，南阳的邓氏外戚上台秉国执政，就与三辅官僚势力下降而其他地域的士族、官僚逐渐在中央取得优势有关。随着各大士族集团势力的消长和皇权的需要，南阳的阴氏和邓氏家族，西北的马氏、窦氏和梁氏家族这些资深望重的士族著姓，垄断了皇后和大将军的选择权。自东汉立朝到桓帝时期的 11 名皇后中他们输送了 9 名，6 名大将军中他们输送了 5 名。阴、窦、邓、梁每族甚至出了 2 名皇后。

章和二年（88 年），章帝去世，年仅 10 岁的和帝继位。和帝

^① 参李禹阶、秦学顾：《外戚与皇权》，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7—119 页。

年幼，无法亲执政柄，窦太后便按例临朝称制，控制了朝廷的最高权力。从表面上看，外戚干政似乎出于幼君嗣位之偶然，但是，将窦氏干政作为东汉一代历久不衰的外戚擅政历史的开端来观察，就会发现，偶然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①。士族豪强势力的发展，要求扭转东汉前期的勋臣贵族受压抑的局面。尤其是三辅官僚集团势力日益增长，对于他们来说，既要保持皇权这一“正统”工具，又要求皇权不抑制他们的政治特权。这样，拥立一个便于控制的年幼皇帝作为正统的偶像，而把最高统治的支配权掌握在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外戚手中，便是最好的方案。本来，刘氏宗族对皇位的继承与皇权的巩固应该发挥作用，可是由于东汉前期的强干弱枝政策使宗室诸王受到过于沉重的打击，他们已丧失了振兴王室的能力，从而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了。于是，年幼的和帝作为法定的皇太子承继大统，就为三辅士族操纵统治权柄的政治局面的顺利形成提供了契机。

窦太后临朝，其兄弟窦宪兼三军之任，窦笃、窦景总宫卫之权，一门兄弟子侄并居要位，党羽充斥朝廷，地方刺史、守令多出其门。朝廷正直之士或遭贬黜，或被杀戮，公卿大臣畏惮窦氏淫威，有的怀持两端缄口不言，有的则望风承旨、为虎作伥^②，朝政一派昏乱。

窦氏权势过度膨胀而凌驾于皇权之上，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危及东汉王朝的生存，所以，既为皇帝不能容忍，也为整个地主阶级所反对。永元四年（92年），怀着强烈愤懑的和帝与“一心王室，不事豪党”的郑众密谋^③，在丁鸿、任隗等朝廷公卿大臣支持下，诛杀了窦氏。郑众以首谋之功升迁为大长秋，以

① 参《外戚与皇权》，第120页。

②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卷四十三《何敞传》。

③ 《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郑众》。